旧上海看篮球比赛

蒋星煜

我是篮球的铁杆球迷，少年时代起每逢精彩比赛，就尽可能买张票子，挤进球场，看个过瘾。

当时篮球没有职业化，也不存在什么俱乐部，更没有赞助商。国内有四支属于大专院校的篮球劲旅：中央军校、国立体专、南开大学和上海的暨南大学，那些名将诸如李震中、唐宝堃、王玉增、牟作云、邝耀雅、蔡演雄、王南珍等等，都分别属于那四个球队。抗战之前那次奥运会，中国参加了篮球比赛，队员也都是来自那四个球队。

照理说，上海的大专院校很多，但复旦只注重排球，持志大学也有篮球队，但是水平比那四支球队，显然要低一个层次，无法相提并论。

最最正规化的比赛篮球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50号的西侨青年会的室内篮球场，虽然面积不大，但楼上仍有和楼下同样数目的座位。在江湾也有新建的室内篮球场，那时江湾已经是郊区，晚上也不能在那里举行篮球比赛。如果举行，市中心的观众也不会去看球。

正因为这些球员都是大学生，他们主要的任务是读书，不可能以比赛为“正业”，所以比赛安排在星期六或星期天的晚上为多，票价也不贵，我们中学生也负担得起。

话说回来，中央军校、国立体专、南开大学都分别设在南京和天津，暨南大学的校队有时找不到对手，就和美国驻沪海军或海军陆战队比赛，他们球艺虽然一般，但那时中国篮球队员身材都是矮中挑长，但仍比现在的姚明要矮得多。美军篮球队有两个，一队名“海贼”，一队名“麦令斯”，两队各拥有一名身材特高的前锋，分别为洛克和莱茵。他们都是站在篮下，球传到手，就往下“灌”进去。

有时中央军校、国立体专和南开大学这三支球队也来上海，我们便有特别精彩的比赛可以看了。

当时篮球场上最风光的明星运动员就是李震中。他是所属球队的中锋，主力。由于身高仍稍逊现在的姚明，当时中国篮球名将都是抛物线式的投篮，美国海军凭身材高大已经是垂直地“灌篮”了，而李震中有他特殊技巧，虽然身高不及美国人，但他把球托在掌心，跃起时手掌与篮圈正好平衡，轻轻一推，球就进了，所以被称之为“托塔李天王”。我有幸观摩过不少次数李震中的“托球进网”，无比愉快。因为他的动作还有很多特别之处，有时跃起以后，遇到意外的阻挡，他会临时改变角度，在半空中呈现出一种难以设想之舞蹈美。

欧洲写生系列之七 刘云

由于暨南大学就在上海，我观看暨南大学篮球队的比赛次数最多。蔡演雄和王南珍都是后卫，也是那次奥运会中国篮球队的后卫。他们两人要防卫的对手都是比自己身材高大的前锋，却又极少犯规，确有一些绝招。我看更主要的是心态。任何一场比赛，他们有一句口头禅：“慢慢交”。动作文明而细心。

曾经有一支球队，名为“宁绍”，究竟是同乡会还是某个企业所组织，不知道。其中有一球员，打球技术相当高。

印象中还有一些球员如：许文奎、张良雄、沈聿恭等，技术也相当好，他们属于哪支球队记不清了。其中许文奎，既是篮球运动员，又是足球运动员，所以他打球时路子不同寻常，投篮角度往往很特别，别人很难防守。

我在西侨青年会看比赛，多数是买楼下的票子。如果楼下卖光了，我才会到楼上去看。因为楼上第一排还好，第二、三排俯瞰楼下，多少总有些死角。再说，天气热的话，球员汗流浃背，汗酸气发散不开，就往上冲，在楼上更吃劲消。

西侨青年会的比赛裁判基本上是瞿鸿律或刘荷生，他们两位英语说得十分流畅，所以和“海贼”或“麦令斯”比赛时，也都掌握得很好，球队从未发生争执，观众更是口服心服，似乎欣赏他们两人的裁判，也是一种享受。

上海成为“孤岛”之后，西侨青年会的比赛比本来要少一些，水平要低一些。退而求其次，国光中学和光实中学也曾经有些比赛，那是不需要买门票的。国光中学的球队主要是王南群，毕业后进入大夏大学，放弃了篮球。解放后在上海银行界，是一个中层干部。另有包松圆，一直在篮球场上活动，后来也成了名将，到抗战胜利还没有退役。当年国光中学篮球队的中锋李祖德，技术很不错，因为实际上并不上课读书，所以生活毫无规律，不久就在人间蒸发了。那是很可惜的。国光中学的比赛基本上由闻宗元任裁判，此人也很公正，绰号闻太师，人缘不错。

当年的篮球运动和现在的篮球运动，无论在组织上或操作上都没有可比性，而且根本就没有听到过“外援”这种提法。但是，像李震中这样在技术上富有独创精神，像蔡演雄这样斯斯文文打球，球场上决不会发生冲突。这一些，仍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

过凤阳参观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

秦史轶

一梦凤阳六百年，穞人从此出新篇。签名屋里除陈疾①，包干田间忆旧贤。乞食从前花鼓咽，喜尝今日果莓鲜②。濠梁岂止钓鱼乐，龙寺钟声夜不眠③。

①签名屋，应为“大包干”签字时原物。②此地今盛产葡萄、蓝莓、菌菇等物。③濠梁钓台、龙兴寺钟楼皆为凤阳景点也。

雨人

汪芳

Liberman先生是犹太籍的美国人，如同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一样的命运，他的祖父在二战时期移民美国。就看他沾沾自喜家里摆放着那些淘来的中国“宝贝”，就知道对于中国他有多么的热爱。那些假古董其实都是不值钱的赝品。

因为他对中国的膜拜，所以，当年，我们这些初出国门海外的游子也深得他的帮助。

我们回国的时候，Liberman先生优秀的儿子被评为全美优秀的毕业生进入白宫，受到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接见；之后顺利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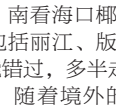
之后，他们又得一子，取名John Nash。看他发来的邮件，可以想象得到中年得子的他简直是喜极而泣。

John Nash两岁时仍然少言寡语，三岁时更少说话，少吃懒动甚至拒绝他们夫妇的拥抱，在哈佛医学院儿童医院被确诊为“儿童自闭症”，也就是“雨人”（rain man）。据说，他们去过全美最好的儿童治疗中心。因为目前医学上对于这种疾病的始因尚不知道、治疗方法都没有完全明了，所以，疗效甚微。

我想象着，已进不惑之年的人将如何承受这样的打击？前些日子，我去美国参加会议，之后绕道而行，特地去探望他，也感念他当年对我们的照顾。

清澈的蓝天之下，旧金山的阳光永远是那么炫丽，阔别多年的Liberman先生两鬓多了许多白发，依旧是精神饱满，还是开朗得很。我的车一停下来，他早早就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门前的栅栏周围仍旧盛开着月季和玫瑰；宽大明亮的客厅依旧摆放着中国元素的假古董，而在角落里面，我看到了那个被称之为“雨人”的孩子：一双典型犹太血统的深蓝眼睛高高挺直的鼻梁而神态却不同普通孩子，他一直愣愣地呆在角落里，一语不发。一眼看到，顿生怜悯，我忍不住想抱抱他，他还是愣愣地呆滞着。



晚饭后Liberman邀我去花园散步，欣赏他种植的花儿和果树，园内枝叶繁茂果蔬累累，蓝紫色的蓝莓飘着清香；枝条上是满枝的梨，夕阳西下，茂密的树丛中鸟儿依旧欢唱；蜜蜂还在飞舞着。

我知道，Liberman先生的生活一定不似当年那么宁静；凭着医生的职业习惯，我担忧着他和John Nash的未来。

Liberman深知我的担忧，他用力握着我的手说，你看天下万事万物飞禽走兽，在天上飞的鸟儿，海里游的鱼儿，并非都耕耘种田。可没有其一会冻死饿死，这就是上帝的定律。

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的礼物，我爱他胜过一切。

知耻

那秋生

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中，最有“羞耻”意识的，大概莫过于唐太宗。据《大唐新语》载：唐太宗拟出游南山，因怕他人指责而作罢。事后，唐太宗非常羞愧地向魏征坦言：“当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至晚年，“羞耻尤甚”，深感有愧于民，所以临终前告诫太子：“我即位以来，做了许多错事：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不致远，行游四方，供顿烦劳。”

“耻”字旁边是个“止”，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知耻之心。《国语·越语》中越王勾践说过：“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因此有了卧薪尝胆与复国雪耻的故事。

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王阳明在《辞封爵晋恩赏以彰国典疏》中指出：“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甚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

一个无耻的人，也就是没有是非、善恶、荣辱观念，丧失了起码的正义感和尊严感。

我们书店朋友多

俞子林

上海图书公司（下设古籍书店、上海旧书店等）是一家以经营古旧书为主的书店。涵盖千年的古旧书，是文化人的最爱，所以书店有许多文化界的朋友。

有一段时间，中央首长来看书买书的很多，胡乔木同志来得最多。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上海养病时，几乎每天都来，跑遍了书店的每个书库。

汪道涵市长爱书，是书店的常客。来得多了，对书店情况很了解，关心也多一些。书店有什么活动请他，他一般都能参加。那时书店发展，缺少仓库，在他的关心下获批一块土地，建造了仓库。书店拟与香港合作，创办沪港合资三联书店。当时我国还没有中外合资办文化企业的先例，拖了好几年。后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由上海市地方政府特批解决。

“文革”期间现代文学被作为文艺黑线批判，文学作家深受迫害，文学作品大量损毁。剧作家于伶因对江青历史较为了解，被关押九年，抄家十次，搞得片纸不存。“文革”结束后，他说：“现在我只能凭脑袋写书了。”老作家巴金、柯灵、陈伯吹、赵家璧等都到书店来找书，唐弢来得更多。为了解决书源问题，满足读者需要，我们开始影印现代文学书刊，得到了老作家们的支持与帮助。

北京人民日报副刊主编姜德明同志是书店的老朋友。在我们冲破禁区，影印出版现代文学书刊时，得到了他的许多帮助，包括舆论上的支持。一篇称赞我们影印出版《以一化万，功德无量》的文章（作者王观泉），就是发表在1980年6月9日《人民日报》《朝花》副刊上。最近我把拙作《书林岁月》寄赠给他，他在写给我的信中深情地说：“勾起了我对上海的回忆。（以前）我到上海，总愿住在汉口路的解放日报招待所，因为那里离贵店近。我忘不了上海书店赐给我的那些新文学版本，感谢和怀念店内的那些可爱的朋友。”

书店还有一些海外朋友。一位名叫山田奥的日本人，他爱好收藏古砚。上世纪90年代初，他选了一百多方编为《藏砚录》，拿到上海要求用上海古籍书店名义出版发行，他说这是中国的文物，只有在中国出版才有意义。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英国的中国科技文化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每次到中国，都由胡道静先生陪同到上海古籍书店参观、购书。他和胡先生都对《道藏》很有研究，在他们的建议推动下，后来我们出版了全套《道藏》。

爱书人都是文化人。他们既是我们的顾客，又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从他们那里增长知识。

这几年古旧书少了，有一些稀见的上了拍卖场，淘书人感到遗憾。希望这种状况逐步得到改善。

十日谈

古旧书香艺苑真

明日起刊登一组《科普，让我受益》。

旅游

黄阿忠

三十年前，我经常会约上几个画画的同伴去各地写生，或带上学生到全国各地走走、看看、画画。

我们出行的方式很传统，也很简单，乘飞机是不行的，那是要级别的，故交通工具一般是火车（不能乘卧铺）、长途汽车，有时候乘棚车，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是运货的车皮临时拉人，厕所是一只木桶，男的问题不大，把车门拉开一条缝隙即可解决，女同胞惨了，十几个人围成一圈，方便者入内，确不雅观，但亦无奈。还有就是步行了。许多没车的路段或许会遇上牛车和手扶拖拉机，若能搭乘一程，算是额头碰到了天花板。那年代没有旅行车组织安排，全凭自己买票，还要排好换乘接点，有时往往会在一个车站待上一两个小时，遇上票售完的话，你必须又得再耽搁一天。等到了预定目的地后，又会萌生以此地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的想法，苦于路线不明，不知跋山涉水去向，我们会在当地找上一个向导，给他一点费用或者上海带去的物品，由他带领攀山登高。及高岭，旖旎风光尽收眼底，群山逶迤连绵不绝，虚虚朦朦接向无际，更有幽情野趣觅寻；或有村民自告奋勇，引大家涉水渡舟，登岛观光，看灌木丛中瓦砾满地，断壁残垣，散发幽谷之气息，大有感慨。站立礁石望湖面，但见风帆过，波清拍岸，溅起细浪，别有一番趣味。我常独出己见，往往有名胜不觉其佳，而非名胜却自有妙趣，探幽揽情，贵在心有所得。

也不知什么时候起，有了旅行社这个行当，旅游也成了一个风尚。先是国内，东到小岛、渔村，西至雪山、草原，南看海口椰树，北观白山黑水，包括丽江、版纳，还有摩梭人也不能错过，多半走马看花，匆匆走过。随着境外的开放，旅游目指有日本、韩国、新、马、泰，还有越南、柬埔寨，大家争先恐后，一时热潮涌动。而后，人们目光又投向欧洲，从哥本哈根、奥斯陆到西西里岛、庞贝城；从巴黎到巴塞罗那，从马德里到马略卡岛，从威尼斯到阿姆斯特丹，到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常看到领头的高举颜色各异的三角旗，甚为醒目，身后一溜跟上，每到景地，或名胜，先集中简单介绍，而后分散拍照游荡。一般都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到景点拍照，回家则教堂、广场相混，什么都不知道，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程式化的旅游。所谓每到一地，先广场后教堂，顺便看看喷水池塘，外加满地笃行的灰、白鸽子，再登高看全城风貌；还有购物，奥特莱斯，老佛爷与超市以及Shopping贸，都成了国人旅游的一般程序。

渐渐有志旅行者又采取了背包游，自由行以及自驾游等方式。一地待上三两天，看教堂析建筑之风格，走弹硌路品中世纪之韵味；跑美术馆走近大师，观博物馆仰古思今。闲来端坐路边喝咖啡发呆，尽让西风吹拂衣衫，让古罗马气息沁入肺腑，以此作深度的体验。

我喜欢三十年前那种自行买票，寻找心仪景地的旅行方式，那种纯朴、幽情、雅趣以及山川之气息在行进中获取，生命的存在将变得更有意味。

留一处明净

李秩仁 作